

人口经济学及其在我国面临的课题

王更新

人口经济学是一门新兴的边缘学科。它是人口学和经济学为基础，以人口经济关系为主要研究对象的交叉学科。研究人口经济学，对我们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国家具有重要的历史和现实意义。我国人口经济学的研究起步较晚，本文将在对国外人口经济学的研究作一介绍的基础上，探讨我国人口经济学面临的课题。

人口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和定义

在国外的人口经济学著作中常常有经济人口学 (Economic—Demography) 之称。在西方，特别是美国学者通常把这一学科定名为人口经济学 (The Economic of Population)。

所谓人口经济学，主要是考察人口对经济的影响，人口增长对经济增长或经济发展的影响；同时也研究人口变动的经济根源或经济因素，研究人口现象与经济现象之间的联系等等。简言之，就是从人口出发，考察人口对经济的作用，与此同时也考察经济对人口的影响。至于人口经济学的定义，西方学者则众说纷纭。美国人口经济学教授西蒙认为人口经济学是一门经济学科。他这样写道：“作为一门科学，人口学是一门地地道道的经济学科，……人口研究中最重要现象是人口规模变化。而人口规模变化之所以重要，主要是因为它影响可供人们利用的资源。某一人口群体（及其后代）的食物、工业产品、空间及其他资源是富裕、还是贫乏，主要取决于人口规模。”他所撰写的《人口增长经济学》一书，对人口与经济的关系展开了广泛的论述。日本人口经济学家大渊宽给人口经济学下的定义是：

人口经济学是研究“人口变量群和经济变量群的多元的相互依存关系的体系。”这个定义使人口经济学的研究范围相当广泛，既要研究人口变动对经济的影响，这种影响可称为人口效应；也要研究人口变动本身的经济决定作用，或者说，经济变量对人口的影响，这种影响可称为经济效应。人口变动对经济的影响或经济变量对人口的影响，有些是直接的，有些是间接的，通过“媒介变量”即中介环节起作用。这里所讲的媒介变量就是指社会的、政治的、生理的、技术的和文化教育的因素。这些因素在人口与经济的相互作用、相互渗透、相互制约中起某种中介作用。所以说，作为一门科学体系，西方学者对人口经济学的研究对象、范围仍在探讨之中，说法不一，但大多数学者对人口经济学是研究人口与经济关系的科学，则是意见一致的。

人口经济学的历史形成

人们常有一个印象，认为马尔萨斯的《人口原理》开创了在西方国家关于人口问题的研究；而且认为一开始就是从经济角度对人口问题作出分析的。实际上，人口问题在古代就引起思想家们的注意。柏拉图在其《法律》一书中，就曾讨论理想城邦的人口问题。中国古代思想家也对人口经济问题作过不少论述。但这些论述，与其说是一种学说，不如说是一种态度。而这种态度，又有其社会背景。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西方学术界提出了经济适度人口理论。经济适度理论认为，假定其他条件均不变化，达到全部产业最大收益时点的人口为适度人口。然而20世纪30年代，西方资本主义爆发了空前未有的大危机。在大危机中，一方面大批商品积压，工厂倒闭；一方面大批工人失业。这样大量失业的过剩人口是人口自然增长太快造成的吗？显然不是。于是西方经济学和人口学者寻求新的理论来解释这种现象。并且，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发达国家与大

战后相继独立的发展中国家出现了截然不同的人口增长模式——西方发达国家自60年代以来人口出生率明显下降，甚至有些国家出现了负增长；发展中国家却由于死亡率下降，人口不断增殖，人口规模迅速扩大，而经济发展水平却与人口发展水平呈明显对照。由于人口经济关系出现许多新的特点，这就要求西方学术界从理论上作出解释。正是在上述条件下，人口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分支学科应运而生。可以说，人口经济学作为一门科学，是本世纪开始形成和建立起来的。

当代西方人口经济学流派

当代西方人口经济学有宏观人口经济学和微观人口经济学之分。当代宏观人口经济学是指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关于以一个国家或地区乃至整个世界为范围，阐述人口经济关系的理论。宏观人口经济学不但研究范围在逐步扩大，而且在时间序列方面主要是进行长期分析。它从静态分析出发，着重进行动态考察，探讨人口增长长波和经济增长长波之间的关系，研究人口增长率与经济增长率之间的关系，分析人口投资和物质资本（经济投资）投资之间的关系，并且很重视探讨人口变动与自然资源、国民生产总值和人均国民收入之间的关系。同时围绕这个课题形成了悲观主义学派和乐观主义学派。

悲观主义学派主要是一批现代马尔萨斯主义者。在五六十年代初期，主要代表人物是美国学者威廉·福格特（Willian Vogt），他在1949年出版的《生存之路》被认为是现代马尔萨斯主义人口经济理论的代表作。该书的主要理论是：现代世界人口增长已超过了土地和自然资源的负载能力，人类面临灭绝的危险；人类的生存道路，在于控制人口增长，恢复和保持人口数量和土地、自然资源之间的平衡。稍后的W.S.汤普逊（Thompson）和J.H.赫茨勒（Hertzler）提出了“人口压力”论。赫茨勒在1956年出版的

《世界人口危机》中首先提出了“人口爆炸”论，认为世界人口就象氢弹爆炸一样骤然增长了若干倍。并且认为，亚、非、拉地区人民的贫穷和落后的原因是人口迅速增长。50年代末到70年代初期，西方发达国家和亚洲的一些发展中国家，经历了一段经济起飞和持续增长时期。对于经济增长及其后果，西方学术界持有不同的看法。这种不同看法在70年代初期，形成了一场拥护经济增长和反对经济增长的大辩论。悲观主义和乐观主义的形成正是以这次大辩论中的立场来划分经济的。在这场大辩论中，现代马尔萨斯主义者福雷斯特和D·梅多斯等人结合世界人口演变趋势，以罗马俱乐部报告的形式，提出了增长极限论。其基本观点是：假定世界上自然的、经济和社会的关系没有重大变化的条件下，由于世界人口急剧增加、粮食短缺、资源耗竭、环境污染，世界人口和工业生产能力最终会发生非常突然的无法控制的崩溃。并且预言：“早在2100年来到之前，增长就会停止”，对世界未来前途悲观。唯一可行的解决办法是在1975年停止人口增长，到1990年停止工业投资的增长，以实现“增长为零”的“全球性均衡。”

乐观主义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有美国赫德森研究所所长赫曼·康恩（Herman Kahn）和该研究所研究人员布朗、马特尔，以及美国伊利诺利大学的经济学和工商管理学教授朱利安·林肯·西蒙（Julian Lincon-Simon）等人。针对以罗马俱乐部为代表的悲观学派得出世界末日将临的结论，乐观学派则用一种新的视野，提出了激烈的抨击，认为世界经济增长不会停止，也不应该停止。乐观学派指出，只有经济增长才能促进技术创新和发明，社会才能进步，才能减少资源能源的消耗，减少环境污染；并且由于科学技术的进步，使人类可获得新的能源资源和生存空间（例如向月球发展）。所以经济增长不但是必需的，而且是可能的。经济增

长存在巨大的潜力和动力。况且，各国政府谁也不会自动把经济增长阻止在零增长上。乐观主义学派认为，从时期长度为120年—400年的考察来看，美国和世界人口经济增长趋势的前景是美好的。西蒙甚至一反传统的西方人口经济理论（传统的人口经济理论认为：人口增长对发展中国家是不利的），认为：从长远看，发展中国家适度的人口增长所产生的经济效应，要比缓慢的人口增长好得多。他的理论依据是“发明拉力假说”

（invention—pull hypothesis）和“人口推力假说”（population—push hypothesis）。

同乐观主义和悲观主义两学派针锋相对水火不相容的论争相比，现代经济适度人口学说，则是人口经济学家认识比较一致的一种理论。法国著名的人口学家阿尔弗雷·索维（Alfred Sauvy）是现代适度人口理论和经济适度人口学说的主要代表人物。索维给适度人口下的定义是：“一个以最令人满意的方式达到某项特定目标的人口”是适度人口。美国经济学家P.A.萨缪尔逊认为，适度人口或经济适度人口是指按人口平均的收入达到最大值时的人口规模。这就在一定时点上为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口发展与经济发展之间确立了一种要求平衡的函数关系，并用适度区间标志出来，使人们对人口与经济的发展寻求一个“最优点”提供了理论依据。适度人口理论并对“不同的特定目标”——如寻求静态经济适度人口、动态经济适度人口、实力适度人口等提供了不同的方式和数学模型。

微观人口经济学是从家庭的人口经济关系出发，集中探讨家庭规模的经济决策。西方人口经济学家运用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分析家庭规模与家庭收入，抚养子女的成本与效用，孩子的数量与质量等变量之间的关系。同宏观人口经济学着重从整体经济角度考察相比，微观人口经济学偏重于对个人、家庭的生育决策研究，并由这些分散、零星

的意愿和力量汇总形成的人口经济现象。通过研究家庭这一人口经济活动的细胞，深入分析这些现象和由这些现象反映的社会经济联系，从中找出人口变动社会的、心理的、经济的因素，对人口控制和制定计划生育政策，具有一定的实际意义。其代表人物有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哈威·莱宾斯坦（Harvey - Leibenstein），芝加哥大学经济学教授加里·S·贝克尔（Gary S. Becker）和T.保罗·舒尔茨（T. Paul. Schultz）等人。

另外，尚有库兹涅茨（Simon Kuznets）的人口经济增长长波理论，西奥多·舒尔茨（Theodore Schultz）的人口投资学说等等，限于篇幅，在此不一一介绍。

我国人口经济学面临的课题

如前所述，我国人口经济学的研究还不成熟，然而我国的人口发展迅速，1991年底已达11.5亿，在42年中人口翻了一番，人口问题已成为经济发展的一大障碍。目前我国经济改革遇到了一些困难，除了经济体制本身的因素外，人口多、负担重、底子薄、承受能力差（十余年改革进程很大程度上是以国家的财力作依托的），人口发展与经济发展不相适应，是一个相当突出的原因。现实向理论界发出挑战：如何正确认识中国的人口经济问题，科学研究人口经济关系的规律，寻找达到适度人口的途径，为社会主义中国现代化服务，是摆在中国人口经济学面前的一个亟待解决，并具有深远意义的大课题。这种挑战又为中国人口经济学理论的建立和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前景，为人口经济学理论工作者提供了机遇和广阔的驰骋天地。我认为，鉴于中国的现状，由于人口经济问题已迫在眉睫，我国的人口经济学研究应该理论与实践并重，基础理论可沿袭比较成熟的经济理论和人口理论，扬弃和借鉴外国的人口经济理论。研究的着重点在于探讨实用模型的建立和具体政策的制定上。要体现可操作性。由于笔者本人不是人口经济学专

家，只是一名对人口经济学感兴趣的青年学者，故不敢斗胆框定我国人口经济学的研究范围。然而联系我国的实际，认为有以下几个方面的课题是我国人口经济学需要首先研究探讨，并作出回答的：

1.把人口变动作为经济发展的一个内生因素加以分析，即研究人口经济效应。在既定的现实条件下（人口规模高于经济发展水平），如何创造一种体制或具体政策，来引导人们（主要指生产人口）最大限度地发挥个人的劳动潜能，使“人口”变为“人手”？如果中国的隐性失业改善一半的话，那么劳动生产率可以提高很多。这就树立了一个客观正视“人口多”这样一个现存事实的积极态度。根据这一思想，似乎可以得出两点启发：（1）资金、劳动力、土地是生产力的三要素，假定有足够的劳动力，土地尚未利用完（事实上低于边际收益的土地尚未开垦）那么增加资金投入对发展生产、充分就业、增加收益是有利的。是不是据此可以这样说，我们这样一个大国，从长远看，增加一定比例的投资可能对经济发展是有利的？特别是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后，大批剩余劳动力涌向城市寻找就业机会，形成事实上的和潜在的劳工移民，当经济紧缩时他们成为大批“盲流”这一社会人口经济现象需要深入分析研究（当然，我国的国情是一要吃饭，二要生产。在投资膨胀、影响吃饭时，治理整顿是必要的）。（2）如果西蒙的“人口推力”和“发明拉力”假说得以成立，我们怎样根据中国的特点来使既存的人口增长成为好事，而不成为经济发展的负担？

2.探讨经济条件对人口变动的影响，以及用什么样的政策、方法才能从利益上（如经济利益）引导农民自觉地节制生育，从而达到控制我国人口增长过快的目的？从目前超生的地区划分来看，农村的计划生育工作做得比城市差。这除了社会意识和文化教育因

素外，经济因素不能不认为是一个主要因素。虽然城市里对“一对夫妻只生一个孩子”有这样那样的看法，并且一个孩子大大低于城市夫妻的期望生育值（一般意愿是2—3个孩子）。但就上海来看，有95%以上的青年夫妇执行了国家的这一政策。为什么同一政策在农村则遭到一部分人这样那样的抵制？其经济机理作用是怎样付诸于对孩子的生育行为的？这些都有待于深入研究。

3.探讨家庭规模的经济效应和经济决策，研究经济发展水平与城乡家庭规模的关系。为什么城市中小家庭日趋增多，而农村中则崇尚大家庭，除社会风尚、传统意识外，经济因素是什么？家庭规模发展趋势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等等。

4.人口投资和人口经济效益。“减少人口数量，提高人口质量”是我国人口政策的总方针。人口投资主要在于研究改善人口素质方面。另外，在减少人口数量方面，如何针对农村人口培养费用低的特点，采用提高超生孩子的成本，来达到限制农民超计划生育？如何借用西方人口经济学方法，研究和进行我国人口控制的成本效益分析？

5.我国在确定适度人口规模时，如何从社会、经济、资源、生态环境等诸因素进行科学的测定，其中经济因素与其他因素之间存在怎样的内在联系？

我国人口经济学面临的课题很多，以上只是部分急待解决的几个方面。这些课题不是彼此孤立，互不关联的，恰恰相反，它们是紧密相联、相互渗透、相互交错的。我们期待我国的经济学界和人口学界共同努力，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立场和方法，借鉴吸收外国在这方面已取得的合理的科学的成份，得出自己的结论，以利于创立和发展我国马列主义的人口经济学，和我们正在进行的宏伟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作者工作单位：上海立信经济研究所）